

滚动经济

山西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编

主编 王云山



山西人民出版社

滚动经济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阳泉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0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ISBN 7—203—00352—4

F·40 定价: 3.40元

编委名单

主 编	王云山	张沁文	
副 主 编	尚志斌	赵润林	
编 委	王云山	张沁文	孙承忠
	尚志斌	谢嘉义	郭 圭
	赵润林		

撰写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伯知	王云山	王文书	王天定
王志鹏	王旗海	张 凯	张 亮
张文智	张晋生	李生禄	孟 荷
尚志斌	周新润	胡农厚	胡晓书
赵润林	郭 圭	徐广柱	高伯章
葛力泉	谢文秀	谢长命	温金生

特约编辑 张 亮

序

王庭栋

一个省的整体经济发展，有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也是研究整体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山西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对阳泉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是一系列区域经济研究的组成部分。

阳泉市是国家无烟煤生产大型基地之一。社会主义的矿区，不只要挖出煤来，而且要使矿区经济长期繁荣富裕。既要保证建设好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重点项目，又要使乡镇经济一体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阳泉农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主要是转移到乡村工业。农村产值构成中，农业占百分之十三，乡村工业、第三产业占百分之八十七。农民人均纯收入五百九十九元。成为山西省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阳泉的乡村工业正在实现一个重大的转变，一是由地下转地上，地下地上相结合；二是由半封闭状态到开放，多方面发展横向联合。

山西省有七十多个县区拥有较丰富的矿藏资源。这是具有山西特点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依据。阳泉的地理特征、矿产资源

和农业生产条件是位于太行、吕梁两山有煤县区的—个典型。研究阳泉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对于其他地区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滚动经济》一书，对于农村如何深化改革，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提出一些思路 and 对策，值得类似地区参考。比如：从地下产业起步，向地上工业发展，向技术、资金密集转化，实现滚动发展；抓紧智力、技术、信息和市场的开发；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强化统一经营层次，等等。

山西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就是，专门研究人员和农村实际工作者相结合，领导干部和研究人员相结合，从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发现新事物，总结新事物，推广新事物。这是新时期推进农村改革研究的重要途径。

愿更多的专业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结合起来，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把我省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为“七五”时期农业上一个新台阶作出新贡献。

导 言

一、滚动经济的基本特征

我们通过对阳泉市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看到一个在较短时间内靠自我滚动发展的方式，能够初步实现农村工业的产业扩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使整个区域经济由温饱型进入宽裕型的发展途径。我们认为，这条路子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们的自我滚动发展过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大致都要经历的过程。因此，我们想，通过对这一地区发展过程的剖视，至少对探索同类区域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会有裨益的。

八十年代的改革，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时代性的科学命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何谓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十亿人口中有八亿农民，这就是最大的中国特色。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同样是农民问题。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农民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这一特殊国情不允许我们沿着西方国家的老路，继续走城市工业化的道路。更何况现代西方发达国家高度集中的城市工业也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由此产生的工农隔绝，消费外差，布局性经济副效应和区域环境危机等重重令人困扰的问题，已迫使她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正如《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所

指出的,由城市向农村的经济扩散,或叫做分散,已成为当今改变整个西方社会经济生活的趋势之一。我们再走城市工业化道路,其结果无疑是重蹈西方国家的历史覆辙。所以,无论从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还是从吸取、借鉴西方国家历史教训的角度出发,我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必须在充分发展国家城市工业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去发展农村工业,并以农村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推进我国经济的整体现代化。这应当是中国农村发展和中国工业化的基本道路。

但是,这条路怎么走呢?老祖宗的经验里找不到这样的记忆,浩如烟海的经典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外国人创造的现代文明发展史上缺乏这样的先例。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过去没有,书上没有,外国也没有。搬不来,抄不来,买不来。这已是事实早就证明了的。然而,中国人民用自己在改革中的实践宣告了这样一条时代的真理:路就在我们自己脚下。

农村改革的实践在不断更新着人们的存在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生机勃勃的开拓性生产活动,使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经验积累和理论思维成果都显得黯然失色。经济开发的丰富实践,促使理论研究必须进行新概念的开发。

本书奉献给大家的,是太行山西麓中段——山西省阳泉市所属一区二县,由农村改革以来经济勃发过程的运行轨迹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山区农村经济自我滚动发展的全息图象。阳泉市位于山西省的东大门娘子关下,为三晋东部交通要冲。全市所属农村一区两县(即郊区、平定、盂县),农业人口70.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5.4%。全境4,452平方公里,山地和丘陵占到80%以上,耕地面积115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17.22%,大多分布在土石山坡,农业生产条件很差。然而,这里也有自己的优势:矿产资源分布广、种类多、储量大,现初步探明的矿藏达50多种。主要有煤、铁、铝矾石、硫铁、磷、石棉、硅石、大理石、石灰石、

高岭土等，尤以煤炭资源为最。其中无烟煤闻名中外。阳泉市正是以此为经济依托，成为山西省东部的重型工业城市。但是这里的农民却被长期束缚在狭小的耕地上搞饭吃，农村经济和多数山区一样，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停滞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启动下，阳泉市农民挣脱束缚，大力发展以矿产资源开发和加工为主体的乡村工业，进而打出优势，取得整体效应。到1986年底全市乡镇企业发展到12,037个，农村总产值11.49亿元，比1978年增长3.02倍；农村人均纯收入599元，增长4.3倍，接近市区居民收入水平，由贫困型进入了宽裕型。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53.8%的农业劳动力转入乡镇企业成为工业劳动者，整个农村工农业产品商品率达到82%以上，初步实现了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这是阳泉市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转折。这里的干部群众每当谈到他们在短时期内所发生的这种广泛而又深刻的经济变化时，都把它归结为山区农村经济的自我滚动发展。

为了对这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进行清晰而形象的描述，我们借用群众的语言，并参照现代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中的有关概念，把它姑且称为滚动经济。由这一实践抽象出来的滚动经济，其基本含义是指以矿产资源为各生产要素的吸附载体，通过生产力诸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创造扩大再生产的自生机能，在生产周期循环的渐进延伸中，完成各阶段的资金形成和智能积累，从而实现产业扩展和经济增长的整个经济运行过程。这既是表现在农村工业化前期的产业扩展阶段的一种经济运动过程，也是这一阶段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观点看，所谓滚动经济，就是社会生产力在经济运行中通过自生机能形成的爆发性发展过程。

我们不敢断言这一抽象具有怎样的科学性，但要对一个复杂的经济运行过程进行整体把握和系统描述，除了借助理论思维，

别无它择。这里最能激发我们兴趣的，还不在于概念本身，而在于这种发展方式的特征所反映的实践意义。诚如列宁所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①实践在人类认识整个过程中的地位如此，在我们研究、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特定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也应如此。那种从本本上找出路和企图凭某个人的灵感加特殊外在条件的输入去创造什么模式的做法，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因此，对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由阳泉农村的实践中所看到的滚动经济的运行特征是：

（一）扩大再生产机能的自我生发性，或按照大家的习惯用语，宜截了当应叫做自力更生。我们所以不想用这一词汇，是因为在以往的年代里过多地把它与封闭的自给性农业经济相联系，在人们的心理上已赋予它许多难以说清楚的特定含义。象集体经济、统一经营、工分记酬办法等概念一样，都遭到了相类似的命运。因此，我们用扩大再生机能的自我生发性来表述滚动经济的第一个特征，纯粹是由于避免误解的考虑，并非对新概念有什么特殊嗜好。滚动经济的这一特征，所反映的并非拒绝外力注入，也不是指依靠自身生产能力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自给自足，而是指依靠区域内在的（潜在的）生产能动力量的发挥，产生对外部经济要素的吸附力量，促成扩大再生产的自我启动和自我实现。

阳泉市农村经济启动的自我生发机能是通过区域内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即靠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形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将作专门讨论。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滚动经济何以必定具有这一特征？

^①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哲学笔记》。

对这一问题，人们通常是从区域经济的外部条件来理解的。大致有如下观点：1.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底子薄，基础差，国家没有力量对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给以足够有力的财政资助；2.我们是以农立国的，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占居重大比重，区域经济发展没有大工业可依托；3.我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要积极争取外援，又不能完全依赖外援，更不能掠夺别国来发展我们的经济；等等。

以上所述仅仅是外在因素，还不是问题的本质。根本原因在于，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的形成和启动不是靠某一生产力要素实现的，而必须靠所有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主要包括：必要规模的投资能力，足够的劳动力和合理的劳动力结构（人力资本积累），一定的资源或原材料数量，必要的管理能力（企业家和经营管理人员素质），区域社会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资源，等等。外力作用只在某一要素短缺时的及时补偿这一特定情况下，才能产生效果，才显得有必要。我们通常所以注重外力、外部条件，不论在经济行为上表现为强调自力更生还是竭力要求注入外力，其思想都同出一辙，即过分强调资金作用，甚至把它看成了唯一稀缺资源，而不在生产力诸要素的组装配套上下功夫。这也许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老少边穷”地区虽然投入大量资金，而收效甚微，有的甚至越扶越贫的症结所在。诸生产力要素的配置合理，只能在区域内部完成，这是靠任何外力作用所无法实现的。

（二）经济能量较强的连续再生性。群众形象地把它叫做“鸡生蛋，蛋孵鸡”。就是靠企业自身积累，迅速形成生产规模的扩张或产业的裂变能量。如平定县会里村，原有村办耐火厂，因吃大锅饭管理不善，连年卖石料年收入7~8万元。1981年底由赵义忠承包经营，改记件工资制，加强质量管理，1982年即实现

产值17万元，当年翻一番。1983年实现产值34万元，再翻一番。二年积累资金7万元。1983年7月，赵义忠利用这7万元的积累，又贷款4万元，共投资11万元建起第二耐火材料厂，当年推出耐火坩锅这种新产品。原厂命名第一耐火材料厂，交由另一人管理。1984年两厂产值共达54万元，比上年又增长58.8%。第二耐火材料厂一年多收回投资，并积累资金6万元。1984年7月，赵义忠又用这6万元积累资金，加上12万元贷款和第二耐火厂生产的坩锅作为现实积累以实物（产品）资金形式投入，兴建第三个企业——铁粉厂，当年9月试产成功。这三个企业吸收了全村几乎所有劳动力，农业成为兼业。1986年全村总产值达230万元，人均分配收入850元，比1978年的75元增长了10倍多。

这种扩大再生产能量膨胀的产生机制，主要来之于新的企业承包经营形式和集体通过分配手段抑制消费，强化了积累功能和资金集中调用能力。更确切地说，是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而确立企业的经济主体地位而得以实现的。按承包合同规定，企业利润及形成资产为集体所有，但积累基金支配权归承包人，只限于扩大再生产。这体现了一种双方相互制约关系，既避免了原集体经济下积累资金被平调或挪作非生产用项，又可对承包人进行监督。这种在资金管理上显然缺乏严密制度约束的特殊形式，纯粹维系于宗亲观念基础上的人格信赖，虽少了一点科学性，但确实给了承包人放手发展企业的充分经营权。

（三）产业分化的有序系列延伸性。滚动经济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有序系列延伸扩展基础上，有明确的目标模式而不是靠所谓“麻雀战”式的一哄而起，这是与五十年代末大办“五小工业”的方式的本质不同点之一。其有序系列延伸表现为由资源开采起步，充分发挥现实积累（以产品投入再生产过程）作用，进入初加工、再加工、深加工、精加工，步步延伸发展，形成系列产品。企业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具有很大的市

场伸缩弹性。现在形成的主要生产系列有煤炭采掘加工系列，铝矾土开采加工系列，粘土和以粘土为原料的建材产品生产系列，石灰石开采加工系列和铁矿开采加工系列，等等。

这种产业的有序系列延伸扩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工业体系，克服了发展盲目性，保证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避免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及经济增长的猛涨暴跌。这一特征的形成，除了产业自身熟化和递进发展客观规律作用外，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宏观控制来实现的。乡镇企业的新建项目必须经过县级综合论证批准，方可获准贷款和允许投资上马。这一点我们在后边的政府行为中还将详加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生产的规模集聚性。阳泉农村经济在短短数年的滚动发展中，几乎浓缩了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由分散发展，自由竞争，逐步走上规模集聚的道路。这是由以下两方面客观经济要求所决定的。

一是在企业追求规模效益的经济动机驱使下，技术积累，内部个别分工程度都迅速提高，在生产工艺流程上的各个环节不断向专业化，对投入要素的容量越来越大，相应产出规模便也出现了高速发展的势头。

二是生产不断向加工深度延伸，生产行业很快形成。他们在经历了激烈竞争之后，发现在矿产品原材料市场逐步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中，自己唯一有效的竞争手段是竞相降价，生产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甚至已接近生产成本，企业无利可图。产一吨煤企业盈利仅几角钱。出于维护行业利益的本能，同类企业逐步向本行业有权威性企业靠拢，原材料供应企业向终端产品企业靠拢。通过横向和纵向联合，打破所有制界限形成地区性企业集团。如阳泉市耐火材料厂与郊区前洼耐火材料厂等五个单位组成耐火材料总厂，实行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品种规格，统一销

售价格，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充分发挥了当地耐火材料产品的优势。这就在实现行业价格垄断的过程中，使生产逐步向企业集团规模凝聚。

（五）产品开发的逆向性。传统生产遵循“产供销”方针，市场由生产约束，生产什么供应什么，剩余什么出 卖 什 么。因此，在产品开发战略上注重生产物质要素的拼凑，旨在为生产产品创造物质条件上，这表现为一种顺向思维方式。滚动经济则以逆向开发作为自己的产品开发战略原则。这不在于当事者对这一概念是否有明确认识，而在于他们的经济行为表现。事实上当地政府和企业家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从再生产的终端出发，不断追踪市场，根据市场需求发展某一产品加工；根据加工能力对原材料的需要，确定某一资源的开采规模。当地农民企业家把这种开发战略叫做以销促产。整个生产由指令性计划约束，转向市场条件约束。这种通过搞好流通、加工，为资源开发不断创造新的需求的开发战略，提高了初产品加工增值能力，加速了资源开发步伐，成为滚动经济最重要的“软件”组成部分。

从以上经济运行特征的概括中，也许能使我们滚动经济有一个粗略的概念性认识。至于这些特征，乃至滚动经济的概念表述是否准确、科学，作者也缺乏足够的自信，还是让大家从以下对阳泉农村经济发展实践过程的具体剖析中自己去作结论吧。

二、滚动经济的启动

阳泉市农村经济高速滚动发展的起点，是社会经济资源按照商品经济要求所进行的重新配置和优化组合，由此实现了区域经济扩大再生产的自我生发机能的再造。这与一般农业区域通过联产承包，重新确立家庭经济作为社会基本生产单元的地位，从而

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的情形有着很大区别。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择业自由权的重新获得。虽则在解放生产力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一般农业区域生产力多是从人民公社的组织体制下解放出来的；而这里的农村生产力则主要是从“以粮为纲”的政策体制下解放出来的。要说明这一点，就有必要多少作一点历史的回顾和对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反思。

前边已作过介绍，阳泉市农村地处太行山区，土薄石厚，耕作条件很差，但矿藏资源却十分丰富。历史上这里的农民就为环境所逼，多有“靠山吃山”从“下窑、烧锅、开作坊”^①中找饭吃的。清朝雍正皇帝在给当时直隶总督的训谕中就曾叙述过这一情形，“山西平定州等处，山多田少粮食恒艰，小民向赖陶冶器具，输运直省易米以供朝夕”^②。其用意显然在于提醒地方官员，要充分重视这一地区的经济特点。用现代语言来说就叫做分类指导吧。本世纪初孙中山先生路经阳泉，曾提出过“以太行煤铸平定铁”的经济设想。我们作为当代人，却在改革前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完全懂得了这一点。在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全国一刀切，就是在太行山区这样层峦迭嶂的地方也不例外地要“劳力归田”，无田可归者便来个“千里万担一亩田”精神移土造田。有的甚至连干鲜果树也不放过，提出了“刨倒一棵树，解放二分田”的口号。当时，作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作用的表现，就是农民一再“违背”以粮为纲方针去采煤、烧灰（石灰）、炼硫磺。他们遭到的自然只能是政策卡、制度压、政治上批。搞工副业被指名为“集体的资本主义”，其“罪名”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只要黑白黄^③，不要纲和粮”。于是就发动强大政治攻势，把这种所谓资本主义“从社会上批到集体经济内部，从山上

①指下煤窑、烧砂锅、铸铁器开办各类作坊。

②《平定州志》卷五食货户口第1页。

③“黑白黄”即指煤、石灰和硫磺，一说“白”指铝矾石。

批到村里，从村里批到家庭院落，一直批到人们的头脑里，再从头脑里挖出来彻底消灭！”不要说做，就是想也不准想。现在已成为太行山区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这些人中，为此而低头弯腰遭受批判的不乏其人。

在这种政策体制下，从事工副业的劳动力被压缩为3.2万个，仅占总劳动力的13.4%（按当地政策规定不得超过7—10%）。其余20.66万个劳动力只能淤集在狭小的耕地上进行人为的过量劳动密集生产，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仅五亩多。这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农业生产，实则使众多劳动力处于隐蔽失业状态。按当时生产力的水平，每个劳动力平均可耕种10—15亩土地，据此推算1978年阳泉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应在10万左右，约占总劳动力的40%。这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造成的产业结构不协调，一方面在现实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劳动力过剩或土地占有严重不足，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导致大量可利用资源——矿藏资源的闲置。因此，经济发展不能不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收入水平便理所当然只能徘徊在贫困线上。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1978年全市农村在不扣除折旧费的情况下，资金积累率（积累金额/总收入）虽高达13.33%，但金额不过两千多万元，若扣除折旧费便基本不存在什么积累。可见在这种单一结构的经济状态下，很难形成什么扩大再生产的自我生发功能。

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地区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原因，以便从中找到扫除经济阻滞因素的突破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阳泉农村经济何以能产生后来一经启动，便推向高速滚动发展的爆发力量。但是，在农村改革之初由于对党中央改革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许多地方没有想到这一层上。

农村第一步改革是从实行生产责任制起步，并以推广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改革以来的实践已证明，这对多数农村来说，确实找到了症结，使家庭经营积极性得到了充

分发挥，凝聚成了强大的社会生产能量，把农业生产推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道路。但在类似阳泉农村这样的地方却出现了反常“气候”，土地包不下去。因为干部群众一则由于对改革不理解或有思想抵触，或有一定疑虑；再则都清楚地看到，按土地实行分户联产承包，只能把劳动力在从大集体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再置于小块土地的束缚之下。这不是他们的经济发展出路所在，农民从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本能出发，纷纷要求承包工副业。所以，在轰轰烈烈的联产承包形势下，阳泉农村从1979年到1982年底，在体制改革方面表现比较沉寂。

虽然如此，可他们毕竟还是从联产承包的过程中，领悟到了允许农民有经营自主权和择业自由权的政策精神。通过贯彻党中央稍后发出的关于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通知，更使当地干部群众放开了手脚。1981年，一区二县（当时还未实行市管县体制）党委和政府分别提出了发展以“黑、白、黄”（煤炭、矾石、硫磺）等采掘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的规划设想。矿产资源以极强的经济吸附能力把一批批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吸引出来。从此，农村劳动力开始了这个区域内历史性的战略转移。

压抑既久，暴发愈强。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重新组合，使农村经济系统出现了火山般的能量释放。以采掘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黑、白、黄”堂堂正正成了阳泉经济环流运行的主要源泉。到1983年底，全市乡镇企业发展到3,370个，较三年前增加了16.6%，8万多个农业劳动力成为农村的工人，占到了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2.4%。

除了历史的原因外，劳动力与矿产资源的结合这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也是这一区域当时所能进行的最现实的选择。这是因为：

（一）当地农民具有从事采掘业的传统。所以，发展采掘业不仅是对闲置矿山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对传统生产技术这种社

会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一发展战略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充分发挥当地两大资源优势基础上的，具有现实可靠性。

（二）由采掘业的生产特点所决定。采掘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生产，与其他工业生产相比较所需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技术强度要求的弹性较大，容易形成生产能力。这正符合当时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新的就业门路，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现实社会经济状况。

（三）市场导向。在经历了十年动乱和经济破坏之后，八十年代初正是举国百废待兴之时，基建投资呈现膨胀趋势，能源和原材料严重紧缺，价格节节上涨。从全国四面八方涌向阳泉要求订货的采购人员，把这些信息带给农民，激发了他们要求致富的强烈愿望和冲动。

（四）进城的机会极少。况且城市与矿山比较，对太行山区农民来说，那里显然较少有他们施展本事的场所和机会。

这些社会、经济、时代的综合因素，共同促成了农民与矿山结合的机遇。他们紧紧抓住了这个不可多得的时代机遇，并在利用这一机遇进行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组合过程中，对如何利用三十年集体经济形成的各种积累这一问题，表现了过人的聪明之处。这里所说的集体积累，包括组织资源积累、物质积累和精神积累。

首先，他们对集体经济形成的组织资源积累没有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而是在积极扬弃的过程中，进行了充分利用。组织资源这个概念，对多数农村人来说一定会产生陌生、怪癖的印象。历来人们偏重物质性的经济资源，而社会资源在人们的观念中几乎不占据什么位置。这不能说不是农村传统价值观念中的一个先天缺陷，其根源自然在于长期的自给性农业经济影响。殊不知许多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不仅由于物质资料的紧缺，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社会资源的贫乏，其中便包括组织资源的贫乏。对原